

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批判性分析

徐 涛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数字社会主义是当代国外左翼理论中迅速兴起的重要思潮。诸多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数字社会主义方案。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主张“数字/传播社会主义”, 强调数字资源的公共化与信息的共享化; “新计划经济”思潮以算法和反馈机制为基础, 重构数字时代的经济计划模式; 左翼加速主义围绕全面自动化展开讨论, 并进一步提出“平台社会主义”“平台合作主义”等方案, 试图实现平台技术的社会化与民主化。这些数字社会主义方案从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阶级斗争等问题出发, 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延展和更新, 一方面表现出较为深刻的理论批判性, 证明社会主义思想仍活跃在当代国外左翼的舞台; 另一方面, 也为科技发展、技术治理提供了有益思路, 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数字现代化建设、处理数字时代的劳动关系、资本逻辑等一系列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当然, 数字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瑕疵, 它在理论的某些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 低估了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现实可能, 对资本控制和发展起来的数字技术抱有乐观主义倾向。因此, 我们需要以辩证的眼光对待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思潮。

[关键词]数字社会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数字技术治理 理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 (2026) 01-0121-09

一、引言

当代人类正处于一个数字科技、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如果说20世纪末互联网的兴起点燃了人类探索新技术的火种, 那么21世纪以数字和智能技术为轴心的新科技革命, 已然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数字技术的渗透正在使人类社会的组织逻辑与认知方式发生巨大变革, “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 显微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1](P1)}与此同时, 资本也在不断寻求

新的存活方式, 在数字时代与新技术“合谋”催生出了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监视资本主义等多种新型资本形态, 借此延续其生命逻辑并在更深层次上拓展资本积累与剩余价值提取的边界。面对此种情境, 我们是否就应该抵制或惧怕新技术的发展, 从而幻想“回归一个没有被大数据和算法玷污的前数字社会”^[2]?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恩格斯曾指出: “在马克思看来,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P602)}经典作家从未将技术视为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消极因素, 相反, 他们始终强调技术所蕴含的历史解放潜能。只是在资本主

收稿日期: 2025-06-27; 修回日期: 2025-07-07

作者简介: 徐涛,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研究。

义条件下,技术被扭曲为剩余价值实现与资本扩张的工具。因此,关键在于让技术发挥其社会解放属性,而不能让其沦为资本的附庸。在此方面,诸多国外左翼学者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批判性研究,他们不仅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等新型资本形态的内在矛盾,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数字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就目前来看,国内学界对数字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并未给予充分关注,故而本文试通过对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脉络、核心议题、价值意义、不足之处等方面进行总体性论述,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

二、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谱系

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既有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新剥削机制的批判式回应、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下简称“新自由主义”)危机、技术进步等现实因素的驱动,也离不开国际左翼理论界对自身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是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起,首先源自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和反思。美国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在20世纪末率先提出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发生的新变化,指出因特网被当做一种极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成为扩大资本主义势力范围的一把利剑。^{[4](P92)}随着数字、平台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过程,催生出的数字资本主义不断强化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愈来愈多的学者对此展开批判性反思并形成了一系列

富有启发和前瞻性的理论成果。例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从数字媒介的视角阐释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用户的在线行为、社交互动所产生的数据是如何被资本转化为商品的数字劳动理论;美国学者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提出监控资本主义,认为其孕育着一种新型权力并不断威胁着自由、民主及隐私^[5],揭露了资本主义如何以监视、预测和操纵用户等手段将个人数据转化为新的剩余价值。诸如此类的理论研究指不胜屈。进一步看,这些学者并未止步于对数字资本主义及其衍生形态的理论批判,他们提出了针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思考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反击资本主义。比如,数据的集体所有权、争取数字劳工权利等,均是数字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左翼学者试图以此替代数字经济的运行逻辑及其背后的生产关系本质。

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另一个重要推力来自数字、智能等新技术自身的进步性。国外左翼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具有传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这些优势正是实现数字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例如,“赛博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计算机网络与大数据算法的出现能够解决传统社会主义的核算难题,实现有效且民主化的计划性经济。历史上智利的Cybersyn项目^①和苏联OGAS计划^②就曾尝试通过网络和信息技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但由于官僚化严重、体制内部保守力量阻碍以及当时技术的限制等种种历史因素,最后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当下数字技术相较于20世纪的苏联和智利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更新,在技术上更有可能实现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① Cybersyn项目全称为“赛博协同系统”(Cybernetic Synergy),由智利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于1971年启动,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主持设计。项目目标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和控制论原理,建立一套高效的经济信息反馈与管理系统,以优化国有企业和经济计划的运作。

② 苏联的OGAS计划,全称为“全国自动化经济管理系统”(Общ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авто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ая система учёта и обработки информации,缩写OGAS),由维克托·格卢什科夫(Viktor Glushkov)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计划设想通过全国范围的计算机网络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信息处理系统,实现对苏联经济的科学化、实时化、高效化管理。

新自由主义逐渐显露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危机,进一步催生了数字社会主义等资本主义替代性理论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转向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的确助使西方国家走出经济困境并实现了一段时期内的温和式增长,但它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反而是随着时间的迁移逐渐失灵并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政治冲突等更为深重的危机。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其新著《新世纪的灾难》中提出新自由主义在当代面临极右势力复活、生态环境恶化、地缘政治紧张等多重危机。^[6]哈维(David Harvey)也指出:“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7][P3]}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西方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和无助,他们渴望一个异于资本主义的无剥削社会。“恰逢此时数字技术的进步为其打开思维空间提供了有价值的物质条件”^[8],国外左翼学者借此回到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下,通过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的融合,提出了数字社会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回应。

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还离不开国外左翼学者的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末东欧剧变背景下曾一度陷入低谷,但仍有部分左翼学者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并不把苏联解体归因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此基础上,他们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替代性设想,如民主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参与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数字社会主义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理论传统上的进一步创新,积极回应数字时代的挑战。例如,数字社会主义提出的数字工人的阶级斗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9],这与民主计划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反驳工人阶级“消失论”是一致的;“平台社会主义”提出的“民主参与和分散式治理”^{[10][P3]},一定程度上参考了美国学者汉内尔(Robin Hahnel)与艾伯特(Michael Albert)长期支持的参与式社会主义。从客观上讲,国外左翼学者提出的各

类数字社会主义方案未经过实践的检验,但这并不妨碍其体现出直面数字资本主义、试图对抗其剥削逻辑的理论勇气与批判精神。作为对资本主义数智化扩张的回应,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展现出独特的思想探索价值,因而不失为当前值得关注的重要理论思潮。

(二)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成谱系

国外左翼学界并未形成对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研究范式,而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新计划经济”思潮、左翼加速主义等众多理论流派的阐释下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理论图景。

第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与“数字/传播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当代国外左翼传播研究中极具批判性和理论深度的一个重要学派,深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传统的影响,他们不仅关注传播媒介与技术本身,还注重其背后的所有制、生产关系、阶级利益等更为本质的分析,在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等新型资本形态方面具有重要的解释力和创新力。除此以外,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福克斯、布卡斯(Dimitris Boucas)等人还以此提出了“数字/传播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方案。福克斯认为交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要素,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进行的自由、平等和开放的交往能够促进社会民主化与广泛参与。数字技术为实现直接民主与集体决策提供了工具,“计算机及其网络为组织信息、交往和合作开辟了新途径”^[11]。英国学者布卡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利用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延续并深化了剥削(数字)劳动力的社会关系”^[12],他在借鉴吸收里什塔(Radovan Richta)和高兹(André Gorz)提出的“左翼”概念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以减少工作、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进行自主性的大众生产、有更多的休闲和消费机会等为特征的“数字/传播社会主义”。综上,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提供了一种在数字时代重构资本主义传播体制与生态的路径。

第二,“新计划经济”思潮以算法核算与反

馈机制重构计划经济方案。“新计划经济”思潮在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强调通过算法、网络技术手段改造传统的计划经济,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来自科技哲学、数字政治经济学等交叉领域,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将技术理性与社会主义愿景融合,主张建立一种“算法驱动的社会主义”或“技术治理型社会主义”。苏格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科克肖特(William Paul Cockshott)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敏锐地观察到互联网、超级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带来的可能性。科克肖特称赞苏联在短时间内建设起重工业基础,但由于计算和通信技术水平有限,未能使这种有计划性的政策继续实施。如今的技术进步使计算机辅助经济计划成为可能。科克肖特指出:“使用分布式计算系统,每个生产单位都能获得当前生产备选方案的社会劳动成本估算。这远比资本主义市场所能达到的速度要快得多。”^{[13](P52)}另一位有影响力的是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他对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进行了现代解读,提出一种基于“数字反馈基础设施”的社会主义模型。莫罗佐夫认为数字时代的平台和实时数据流等新技术突破了价格传递机制等难点,并提倡左翼“重新夺取对反馈机制的控制权。”^[14]总起来看,“新计划经济”思潮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具有乌托邦色彩。

第三,左翼加速主义的全面自动化与“平台社会主义”。左翼加速主义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激进左翼思潮,他们不是拒绝或回避资本主义所推动的技术发展及其现代性成果,而是主动要求将其利用或重组来推进社会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被广泛视为左翼加速主义的奠基者之一,他认为资本主义加速算法、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最终会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突破口。斯尔尼塞克指出:“通过大众对新技术的政治控制,我们将共同改变我们的世界……21世纪的技术基础设施正在产生资源,使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得以实现。”^{[15](P1)}斯尔尼塞

克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解读,这引起诸多学者针对平台资本主义提出替代方案。代表性学者有詹姆斯·马尔登(James Muldoon)、特雷伯·舒尔茨(Trebor Scholz)等人。马尔登指出,平台资本主义是“为资本主义掠夺人类生命以牟利的核心驱动力的延伸和强化”^{[10](P2)},因此要“通过数字资产的社会所有权和对管理我们数字生活的基础设施与系统的民主控制来组织数字经济。”^{[10](P3)}舒尔茨则是提出一种“平台合作主义”的方案,要求将数字平台置于工人与用户的民主控制之下,建立合作社形式的平台公有制。

三、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与误区

各类数字社会主义方案构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体系,但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出发,其理论主要聚焦于以下三大核心议题,即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去市场化的经济调控机制,以及数字时代无产阶级的斗争及其方法问题。

(一)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第一,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着社会基本性质和结构。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6](P45)}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土地、厂房、机械是资本控制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而到了数字时代,数据、算法、服务器、平台等构成了新的生产资料,由此而产生的数字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则成为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关注的首要维度。国外左翼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和用户行为的控制,是对数字生活的深层殖民。因此,他们普遍主张打破数字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之转为基于“数字公地”“平台共享”的公有化。福克斯在阐释数字社会主义时提出了十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要求“对作为生产资料的通信

手段的集体控制”^[17]。同样,马尔登论述了“平台社会主义”的六大基本目标,其中有三个涉及平台所有权问题的界定,分别是“实现数字资产的社会所有权”“社会能够控制数字平台的治理”“确保数字技术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整个社会得到共享”^{[10](P5-7)}。概括地说,“平台社会主义”就是要在数字平台的社会所有权基础上对其进行民主化的控制和治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回到社会本身的全民共享。对数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争夺在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观点在数字时代的延伸。

第二,去市场化的数字经济计划。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讨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异所绕不开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兰格(Oskar R. Lange)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就曾围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展开过激烈辩论,前者认为不依靠私有制和市场体制的经济制度难以形成有效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因而经济计划缺乏实施基础;而后者不仅认为经济计划在理论上可行,且在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优于市场体系。数字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得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讨论重新进入左翼学术视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认为“拥有超强计算性能的数字技术有助于构建一种垂直性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它将在数字世界的自动规划和理性协调中杜绝由市场自发竞争衍生出的各种生产经营弊端,实现及时而充分的信息反馈和需求匹配。”^[18]科克肖特近年来多次撰文说明数字时代计算机、算法技术的进步为所谓“赛博共产主义”提供了进一步技术支撑,指出“现代通信和处理器使构建民主的控制论经济的任务变得容易得多。”^[19]与之相似,莫罗佐夫一方面对价格与信息的关系进行现代解读,承认“数字反馈基础设施”在当代对市场的价格传递机制的扩展与超越,另一方面批驳新自由主义下的反馈机制所发挥的副作用,倡导“将反馈机制作为哈耶克式自发秩序的数字化版本加以

批判”^[20]。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去市场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思考,体现了当代国外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这一重要制度性特征的重新探索。

第三,去阶级叙事中的数字无产者斗争。传统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界限较为清晰,其阶级地位由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所决定,无产阶级的斗争紧密围绕工厂、工会和劳资关系等方面展开。在数字时代,国外左翼普遍认为无产阶级的结构与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革命主体的理论也面临着新的解释任务。例如,福克斯将谷歌等垄断平台所催生的数字工人贵族“玩工”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之内^[21];梅森则断言当代的无产阶级正置身于一个“日常工作和利润所依赖的通信网络充斥”^{[22](P9)}的社会工厂之中;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甚至将无产阶级解构为抽象意义上的“诸众”^[23]。值得肯定的是,国外左翼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无产阶级在数字时代发生的表象变化,但他们在某些程度上夸大了这种变化,从而使数字社会主义以数字化意义上的抽象主体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治主体,在不同程度上混淆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具体性与实体性存在,将具体历史语境中形成的革命主体置换为一种抽象化、符号化的政治意向。换言之,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阶级”不再仅以所有制关系而定,它延伸至劳动控制权、数据主权和算法治理权等领域。此外,在如何实现数字社会主义的斗争路径上,国外左翼以技术工具理性替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方法,以渐进式改良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除。数字社会主义要求的斗争属于数字经济的狭窄领域,没有充分顾及数字劳动以外更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

(二)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的三重误区

数字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也体现了国外左翼对无剥削社会的合理诉求。但它在诸多层面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在

实践条件与技术潜能的判断上表现出过度的乐观倾向，整体上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第一，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24](P548)}换言之，社会主义是遵循人类历史客观规律的结果，而非以数据、算法等智能技术为依据的数字化推演，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显然偏离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规律。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及其历史使命，认为社会主义必须经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而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则倾向于淡化甚至消解阶级概念，用所谓“诸众”“产销者”“网络协作者”等泛化主体替代无产阶级主体，弱化了阶级斗争的方法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根本性地位。在目标设定方面，数字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阶级、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人联合体等为根本特征的共产主义远景目标不同，他们只停留于平台治理、技术民主化、数据公平分配等浅层的制度改良层面，将社会主义的目标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数字化的技术民主模式。因此，国外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在其核心主张、实现方式、基本目标等方面，表现出对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偏离。

第二，对数字资本主义现实结构的遮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6](P592)}这即是马克思著名的“两个绝不会”论断。当下的数字技术革命确实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拓展了信息流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剥削方式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但这一切仍局限于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结构与制度框架之内。例如，平台资本主义通过数字驱动的劳动过

程控制和算法治理手段实现了比传统工业资本主义更为隐蔽且高效的剩余价值提取方式，而“平台社会主义”沿用的这种平台协作性、用户参与性等特征非但不能挑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反而会进一步掩盖剥削与异化的真实面貌。另外，尽管数字资本主义已经表现出某些学者指认的“过渡积累危机”^[25]或“长期萧条危机”^[26]，但若据此断言资本主义已至顶点、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在西方国家全面爆发仍是为时过早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激化，但资本仍在通过金融化、全球价值链重组等手段维持其“垂而不死”状态，在其内在矛盾尚未完全暴露与耗尽之前，仅凭技术进步是无法实现社会经济形态跨越的，自动导向社会主义生成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第三，对技术中立性及其解放潜能的过度预判。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将算力、算法与自动化等技术视为客观中立的力量，认为只需要民主地掌控这些技术即可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与劳动解放，这种观点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7](P357)}由资本控制并发展起来的技术不是超越阶级关系的中立工具，相反，它内嵌于特定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权力结构之中，技术从根本上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非劳动者的解放。即使“数字/传播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主张社交媒体平台为“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大规模、媒介化互动与对话提供可能”^[28]，“平台社会主义”的代表者马尔登提出数字平台能够“扩展人类自由范围”^{[10](P5)}的维度，但实质而言，当下的数字技术革命尚未具备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质变的充要条件。诚如祖博夫所言：“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监控与资本相互关联，数字技术的本质依然是服务于资本。”^{[29](P14)}另外，数字技术本身蕴含着难以预测的风险。例如，基因编辑、生物识别、情绪计算等技术一

且被滥用,极易引发伦理道德等一系列其他问题。如果将社会主义完全“数字化”,可能会产生新的异化结果。对此,技术哲学家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的指认十分精到:“一旦不友好的超级智能出现,它就会组织我们将其替换或者更改其偏好设置,而我们的命运就因此被锁定了。”^{[30](PXXV-XXVI)}

四、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意义与不足之处

在数字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并造成一系列现实问题的今天,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也并非没有瑕疵,我们需要以辩证的视角予以对待。

第一,国外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为进一步透视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本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走在全球数字理论的最前沿,这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理论热点和最新动态,尤其是全面认识并准确抓住资本主义数智化危机的要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内部视角。”^[31]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其理论的核心议题不仅在于论述数字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还在于揭示出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特征的剥削本质。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对数字生产资料、数字劳动权利等问题的关注,实际上是对资本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深入劳动过程和强化剩余价值剥削的进一步批判性揭示,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有助于深化对数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维度。

第二,激活了国外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体现了左翼对国外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创新。20世纪末东欧剧变的发生使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一度陷入沉寂,西方世界“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思潮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

地位。在此背景下,仍有部分国外左翼学者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劣根性,不满足于纯粹的理论批判,而是开展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替代性设想。这体现出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所具备的勇气和斗争精神。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张不仅延续了社会所有制、经济计划、劳工权利等左翼传统问题,而且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新计划经济”思潮和左翼加速主义等新兴理论流派的阐释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增长点,推动了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扩展和创新。

第三,为科技发展和技术治理提供了有益思路。面对全球数字资本的垄断以及以此而产生的治理失灵、技术伦理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主张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数智治理体系,力求突破现有由少数科技巨头公司主导的全球数字秩序,这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技术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此外,数字社会主义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特殊意义。面对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垄断,数字社会主义主张发展本土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技术主权的跨国合作,致力于打破数字殖民的新依附格局。正如论者指出的:“西方左翼囿于固有局限和弱小的政治影响力,其建构路径及实施方案无法在资本主义世界付诸实施,但种种理论模型中的前沿技术和治理思路,能够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为非西方国家的数智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值得批判性借鉴。”^[31]

第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数字化建设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数字社会主义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替代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但该理论提出的一些科学理念、合理诉求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数字化建设具备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借鉴意义。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主张数据、算法、平台、服务器等已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并强调对这些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这启示着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化改革、发展数字经济时,要充分考量生产资料形式在数字时代发生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仍

是配置资源的工具和发展经济的方式与手段，作为生产要素发挥重要作用。数字资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发展过程中对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起到关键作用，但也应防止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要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32]。数字社会主义提出的“数字公地”“平台合作社”等要求，目的是让技术回归其本真作用，即服务于人，而不是受制于资本逻辑，这启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平台经济、智能制造、AI治理等方面应坚守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以数为民”而非“以数役民”。

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数字社会主义在理论层面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阶级主体、斗争方法、共产主义理想等基本范畴的认识存有偏差。在现实层面低估了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趋于衰退，反而表现出进一步扩张和实现资本主义霸权的现实可能。在技术层面，数字社会主义对技术的中立性及其解放潜能过度预判，陷入了技术乐观主义。其二，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多数停留于左翼学者的理论批判，没有付诸实践，很大程度上也难以付诸实践。国外左翼学者所论述的各种数字社会主义方案均是学理层面的批判研究成果，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特别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式微、工人运动难以广泛动员的当代西方国家，数字社会主义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三，数字社会主义描绘的是一幅理想图景，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虽然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理想制度愿景，但却未能清晰地看到实现这些目标所面临的障碍、阻力和复杂性。它的乌托邦特征体现在其忽略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利益集团的强大惯性以及当前技术基础设施深嵌资本逻辑的事实。总起来看，当代国外左翼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既有创新性、合理性，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以辩证的视角予以对待。

参考文献：

-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盛杨燕, 周涛,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2]蓝江. 从技术治理到数字技术乌托邦——当代数字技术的控制机制和解放潜能[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11): 95-102.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丹·席勒. 数字资本主义[M]. 杨立平,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5]ZUBOFF S.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 30(1): 75-89.
- [6]徐涛.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与无产阶级复归——由卡利尼科斯新著《新世纪的灾难》引发的思考[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25(1): 277-297.
- [7]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简史[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8]李泉, 杜敏.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 动力、特征与抗争[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1): 140-147.
- [9]FUCHS C. Engels@200: Friedrich Engels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J].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21, 19(1): 1-14.
- [10]MULDOON J. Platform Socialism[M]. London: Pluto Press, 2022.
- [11]FUCHS C. Communicative socialism/Digital socialism[J].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20, 18(1): 1-31.
- [12]迪米特里斯·布卡斯, 潘昕培. 数字/传播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现实和可能性[J]. 国外理论动态, 2023(5): 105-115.
- [13]COCKSHOTT W P, COTTRELL A. Towards a new socialism[M]. Nottingham: Spokesman, 1993.
- [14]MOROZOV E. 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J]. New Left Review, 2019, (116/117): 33-67.
- [15]SRNICEK N, WILLIAMS A.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M]. London: Verso, 2015.
-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7]孟飞, 袁欢. 国外学者数字社会主义研究述评[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2): 40-50.
- [18]徐伟轩. 当代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思潮: 核心

- 议题与理论误区[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6): 130-136.
- [19] COCKSHOTT W P.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EB/OL]. (2015-10-20)[2025-06-29]. <https://www.academia.edu/17603402>.
- [20]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车艳秋, 赵家琪. 数字社会主义——大数据时代的经济核算[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5): 76-85.
- [21]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陶兴然. 数字化时代下的工人阶级状况[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3(1): 70-79.
- [22] MASON P.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M]. London: Allen Lane, 2015.
- [23] HARDT M, NEGRI A.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5] 威廉·I·罗宾逊, 赵开开. 下一次经济危机: 数字资本主义与全球警察国家[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18-25.
- [26] ROBERTS M. The long depression[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6.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8] MIRRLEES T. Socialist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Communicating within and against digital capitalism[J]. Socialist Register, 2021, 57(1): 260-278.
- [29] ZUBOFF S.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9.
- [30] 尼克·波斯特洛姆. 超级智能: 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M]. 张体伟, 张玉青,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31] 潘娜. 数字社会主义: 问题域与理论流脉[J]. 开放时代, 2024(5): 144-164, 9.
- [32] 陈学明.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 4-23, 203.

【责任编辑 邱佛梅】

Critical Analysis of Digital Socialism Theory

XU Tao

Abstract: Digital socialism is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trend rapidly emerging in contemporary leftist theories abroad. Building upon critiques of neoliberalism and digital capitalism, numerous scholars have actively explored and developed various forms of digital socialism. The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School advocates “Digital/Communication Socialism,” emphasizing the publiciz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the “New Planned Economy” trend reconstructs economic planning models for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algorithms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Leftist Accelerationism discusses comprehensive automation and further proposes concepts such as “Platform Socialism” and “Platform Cooperationism,” aiming to achieve the soci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platform technologies. These digital socialism proposals extend and renew Marxist socialist theory by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the ownership of digital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planning and markets, and class struggle. On one hand, they demonstrate profound theoretical critique, proving that socialist thought remains vibrant in contemporary leftist discourse abroa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particularly offering reference for socialist nations advancing digital modernization, address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navigating capital logic.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digital socialism suffers from several critical flaws: it deviates from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of Marxism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certain theoretical aspects, underestimates the real potential for further expansion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exhibits an optimistic bias toward capital-controlled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refore, we must approach the theoretical trend of digital socialism with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digital socialism; digital capitalism; scientific socialism; digital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eoretical critique